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1.03.004

延搁与重构：身体叙事学建构的诗学逻辑

廖述务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本土“身体叙事”未涉及对“叙事”的自反性重构，但对“身体”之叙事功能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与反思，这一偏重文化实践的功能性概念可视作身体叙事学的前理论形态。身体叙事学之建构被长期延搁，部分源自于学界对身体/叙事(学)两大元素间矛盾张力的漠视与无措。对“身体”与经典“叙事”的再概念化，是丹尼尔·潘代建构身体叙事学的基本路径。丹尼尔·潘代对“身体”的再概念化是通过历史化来达成的。其对“身体”的重释意在克服对象化“身体”的理论局限，进而将“身体”嵌入到身体叙事学的建构语序中。“叙事”(学)之重心落在形式运用而非故事元素上，这一倾向形成的内在原因在于，叙事学研究者并不知道如何去研究这些要素(如“身体”)。丹尼尔·潘代在批判性反思传统叙事学的基础上完成身体叙事学之重构，其理论兼顾“身体”“叙事”两个维面，是叙述之“是什么”(what)与“如何”(how)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丹尼尔·潘代；身体；叙事；身体叙事；身体叙事学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1)03-0024-06

引用格式：廖述务. 延搁与重构：身体叙事学建构的诗学逻辑[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6(3): 24-29.

Delay and Reconstruction: The Poetic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rporeal Narratology

LIAO Shuw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native “body narrative” does not involve the reflexive r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but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cogni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narrative function of “body”. This functional concept, which pays more attention to cultural practice,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re-theoretical form of Corporeal Narratology. The construction of Corporeal Narratology has been delayed for a long time, which is partly due to the indifference and confusion of the contradictory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elements of body / narrative.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body” and classic “narrative” is the basic way for Daniel Punday to construct Corporeal Narratology. Daniel Punday’s re-conceptualization of “body” is achieved through historicization. Its reinterpretation of “body” is intended to overcome the theoretical limitation of objectifying “body”, and then embed “body” into the constructive order of Corporeal Narratology. Narratology focuses on the use of form rather than story elements.

收稿日期：2021-03-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18ZDA278)

作者简介：廖述务(1981—)，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理论。

The inherent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is tendency is that narratology researchers do not know how to study these elements (such as “body”). Daniel Punday complet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rporeal Narratology on the basis of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raditional narratology. His theory takes into account the two dimensions of “body” and “narrative”, which i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what” and “how”.

Keywords: Daniel Punday; body; narrative; body narrative; Corporeal Narratology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身体叙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中一个重要问题域，并衍化为一个带有本土化特征的理论概念。在与之相关的话语体系中，身体叙事、身体话语、身体写作、身体叙事学等概念之内涵长期处于一种含混未明状态。在一些理论家笔下，这些概念同出而异名，可互为发明、随意置换。一定意义上，“身体叙事”已被操演为文化实践中的功能性概念。这带来工具层面操作的便利，但也导致概念自身意义的湮没与散乱。更重要的在于，概念的功能性蜕变导致其自身自反性潜能的丧失。本土部分理论家已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在理论层面的探索有待深入。

在丹尼尔·潘代 (Daniel Punday) 等西方叙事学家看来，身体叙事、身体话语等概念范畴的混乱需借助于身体叙事学的建构来消除。从理论发展史来看，身体叙事学之建构被长期延搁，这部分源自于学界对身体/叙事(学)两大元素间矛盾张力的漠视与无措。丹尼尔·潘代对这种张力有清醒认知，他认为身体话语传统将身体对象化，遮蔽了身体在叙事层面的能动意义；而经典叙事学只注重形式分析，忽视了身体等叙事要素的叙事功能。可以说，对“身体”与经典“叙事”的再概念化，是丹尼尔·潘代建构身体叙事学的基本路径。身体叙事学关涉身体、叙事、历史等关键维度，它以对经典叙事学的反思为基础，在“身体”与“叙事”、形式(how)与内容(what)、文本与历史之间组构起全新的理论形态。这一新叙事学形态为反思本土“身体叙事”概念提供了重要理论参照。

一 “身体”再概念化：以反思“身体叙事”为契机

“身体叙事”在国内是作为文学创作与批评概念登上历史舞台的。20 世纪 90 年代，在批评家笔

下，“身体写作”与“身体叙事”被赋予近似的语义规定性。两者互为生发，成为几近混同的理论称谓。围绕“身体叙事”形成的话语群落已渐趋丰饶，在当代文学与理论学术史中亦是一种醒目的存在。相比较而言，国外并没有出现类似“身体叙事”的学术潮流，外国学者往往直接从有关身体话语的文学反思中引申出有关身体叙事学的讨论。国内“身体叙事”与域外身体叙事学在表述上接近，但在内涵上有较大差异。国内有关“身体叙事”的研究是文化批评实践的产物，与身体话语理论构成若即若离的关系。总体而言，“身体叙事”采取了与身体话语理论相似的对象化“身体”的方式，正如丹尼尔·潘代所言，在这类叙事研究中，身体通常被描述为许多“事物”之一，与椅子、桌子和石头属于同一类别^[1]。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功能性概念，有关“身体叙事”的话语脉络中也隐伏着顽强的学科化、理论化的学术努力与冲动。在这个维度上，本土业已初步构建起身体叙事学的前理论形态。正因为如此，本土“身体叙事”对“身体”的复杂处理，与域外身体叙事学对“身体”的再概念化构成意味深长的对话关系。

与文坛创作相呼应，本土“身体叙事”概念在生发阶段更多凸显其批评性内涵。谢有顺的《身体修辞》围绕当代文学生产探讨身体叙事与道德、政治伦理的辩证法；葛红兵等人的《身体政治》阐述生理身体在传统视域中的处境，进而讨论身体叙事在现代文学中的历史变迁（从近代政治场域的“身体”、“五四”身体观念到阶级的身体、身体写作）；相关的代表性文章还有陶东风的《中国当代文学中身体叙事的变迁及其文化意味》等。在这一阐释视域中，身体叙事亦即有关身体的写作与叙事。这一界定以书写客体化“身体”的属性为概念之核心语义，进而考察其在创作场域中的复杂内涵与多重关系。随后，这一概念在当代

知识语境中流传甚广,在批评性意涵之外衍生出悖论状态的文化性意涵:不少学者关注身体叙事的女性主义之维,他们借助对西苏、伊丽格瑞等西方理论的工具性挪用,围绕消费时代女性欲望化躯体展开批评性阐发实践;有些学者关注身体叙事、身体镜像与消费文化的关联,如钱中文的《躯体的表现、描写与消费主义》、周宪的《视觉文化的转向》等。部分本土学者试图跳脱出对象化“身体”,将“身体叙事”理论化。王晓华认为,当代身体叙事中显身的并不是本真的身体。这里的身体被呈现为审美的对象(启蒙主义的身体叙事)、欲望和消费的对象(消费主义的身体叙事)以及解构的对象(解构主义的身体叙事),几乎总是被当作客体,真正的身体在身体叙事中是缺位的。他借用尼采的理论指出,灵魂是身体某一部分的名称,身体才是主体。身体在创造世界时也在创造自身,其所有活动都最终回到自身,落实为身体的自我创造。身体同时是自己的作者和作品,是主体和客体,这就是身体的神秘处和神奇处。认识不到身体的这种神秘和神奇品格,就会把本属于身体的主体性归结为他者的属性,阻碍身体-主体在文学艺术中的出场:此乃身体在当代身体叙事中缺位的根本原因^[2]。南帆有关“身体叙事”的讨论亦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与悖论性。他一方面详尽梳理了奥尼尔、马尔库塞、伊格尔顿等人有关身体的理论话语,同时又稍稍涉及了叙事学层面的身体叙事问题。他认为,身体在许多时候隐蔽地形成了叙事的强大动力。巴特的叙事学是一种横向组合(纵向组合仅存在于几个层次之间),而身体对于事件的推动逸出了几个层次而投射于另一根纵轴之上(从社会生活的外部事件进入无意识的区域)。也就是说,叙事已非巴特意义上的纯粹系统。叙事内部具身性(性或暴力)的段落往往过度膨胀,以至于超出了叙事结构的负担^[3]。南帆已经清醒认识到身体叙事的叙事学维度,但他过多地专注于非常态身体(性或暴力)在文本叙事系统之外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忽视了作为叙事“要素”的常态性身体之叙事“形态”问题。

本土“身体叙事”未涉及对“叙事”的自反性重构,但对“身体”之叙事功能有一定程度认知与反思。这种理论上的推进值得肯定,可视为身体叙事学的前理论形态。不过,本土学者在这方

面的探索不多,且建构理论之自觉性与能动性不强,多数研究将“身体”对象化,将其处理为特定语境(更多时候缩减为一具体文本)中的物质性实体,这就极大压缩了“身体”的意义生长空间。

“身体”的对象化是“身体叙事”概念功能化的重要原因,而后的功能化则进一步强化了“身体”对象化的理论与实践惯性。对象化“身体”受限于具体文本语境,是特定文学事件的产物;这一“身体”陈述缺乏普遍性,与其他文学事件中的对象化“身体”并无逻辑上的关联与意义上的共通。因而,在有限意义空间中,对象化“身体”虽是语境化的产物,但在本质上是封闭的、非历史的。

相较而言,丹尼尔·潘代为激活“身体”叙事功能,积极地将其置于身体话语体系中,并恢复其与历史文化的复杂关联。丹尼尔·潘代认为,由18世纪“小说的兴起”定义的现代叙事,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科学文化的出现和由此导致的我们对身体观念的历史变化。身体历史性的彰显是反思叙事之缘起的重要契机。现代叙事、现代身体和叙事学本身都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从一系列相互支持的关于人类身份、文本和身体性的假设中脱颖而出^[11]。显然,丹尼尔·潘代在叙事、“身体”历史化、叙事学之重构间构造起一种动态的阐释机制。或者说,丹尼尔·潘代对“身体”的再概念化是通过历史化来达成的。这种对“身体”的重释意在克服对象化“身体”的理论局限,进而将“身体”嵌入到身体叙事学的建构语序中。丹尼尔·潘代认为,将叙事和身体联系得最好的工作源自新历史主义。经典叙事学与新历史主义在处理叙事中的“身体”时形成了巨大鸿沟。前者构建了抽象的、概括性的叙事模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其对抽象的坚持,进而导致其在处理身体的具体历史对象时陷入困境。相反,新历史主义发展了对身体的细致入微的理解,认为身体是一个可以在当时的话语中观察到特定冲突的场所^[19]。丹尼尔·潘代吸收了新历史主义的身体观念,将叙事中有关身体的超历史的类型分析与特定历史时刻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关注叙事理论中的“身体”,丹尼尔·潘代试图暗示特定的历史条件是如何影响我们对叙事的定义的,同时也把叙事学能够跨越文化和历史的那些文本元素归功于叙事学。叙事作为一个批判性概念的出现,不仅需要

从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早期对话语和身份的思考的变化来历史化，也需要从 20 世纪中叶形成“叙事学”概念的学术批评氛围的角度加以历史化。在整个项目中的几个点上，叙事学以特殊的方式对待人物、事件和情节，因为关于身体的现代观念潜藏在其中^{[1]186}。

二 身体与“叙事”：经典叙事学之不满及重构

“身体”与“叙事”密切关联。“身体”再概念化之目的在于重新赋予其历史属性，从而以此为中介考察“叙事”定义的历史语境与变迁，赋予“叙事”批评性内涵。借助历史化“身体”概念，丹尼尔·潘代对传统“叙事”以及经典叙事学本身进行了深入的反省与批判。

丹尼尔·潘代从身体切入的角度对经典叙事学进行了反思，“尽管身体在文学和文化批评中引起了兴奋，但它对叙事学几乎没有影响。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在许多方面，叙事学是文学批评的领域，传统上最关注的是文化和民间表达的文学之外的形式。叙事学尤其容易受到图画小说、电视和电影等媒介的欢迎。作为文化的一个基本元素，我们可以预期，身体的具象动态会对所有形式的故事讲述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我们没有‘身体’叙事学——没有认真或持续地尝试在叙事中赋予身体一个中心的角色。”^{[1]2} 尽管批评家对身体话题兴味盎然，但叙事学形态的身体“叙事”是一个长期以来被搁置的理论议题。这种情形与本土相关研究有类似之处，本土学者的一些批评文章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元素来展开主题化研究。然而，快速浏览一下任何经典的叙事学介绍（如巴尔、查特曼、马丁）或最著名的综合性研究（斯科尔斯和凯洛格、斯坦泽、科斯特）就会发现，它们对作为叙事学范畴的身体几乎完全缺乏兴趣。

在经典叙事学中，西摩·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其著作《故事和话语：小说与电影中的叙述结构》对文本中存在物之于叙事学的意义展开了深入探讨。叙述中的身体属于文本存在物，但在西摩·查特曼的论述中，这一要素是缺失的。在他看来，叙事是一种交流；被交流的东西是故事，即叙述的形式内容元素，它通过

话语来交流，即形式表达元素。话语是对故事的“陈述”，可分为动态与静态两种类型（对应某人做了某事或某事发生；某物简单地存在于故事中）。动态陈述表现为“做”（DO）或“发生”（HAPPEN）的模式，这不是英语或任何自然语言中的实际词汇（它们构成表达的物质材料），而是更为抽象的表达范畴。英语句子“他刺了自己”和哑剧演员把一把假想的匕首刺进他的心脏都体现了同样的叙述动态陈述。静态陈述表现为“是”（IS）的模式。文本中的一个存在，要么是一个角色，要么是一个背景元素，区别就在于它是否执行了一个具有情节性意义的动作。静态陈述可以传达两个方面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一个存在者的身份或它的特性之一^{[4]32}。针对这种区分，丹尼尔·潘代指出：“一切有关人物的材料（非活动的）仅仅是用来定义事件的背景，这严重低估了身体在赋予人物意义和确定叙述者在故事中的地位方面的作用。”^{[1]3}

西摩·查特曼的重点显然在与“事件”相关的动态陈述上。在他看来，有关存在物本身的陈述是“非叙述的”^{[4]33}，这种等级化的区分影响深远。对此，丹尼尔·潘代认为，叙事学没有被身体的理论所吸引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叙事学有关理论话题的建构方式。叙事学与身体脱离的最广泛的原因可能是它偏爱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所称的“如何”（how）问题，而非“是什么”（what）的问题^{[1]3}。这种偏爱在米克·巴尔的《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就有突出表现。米克·巴尔认为，事件、行动者、时间和地点一起构成了寓言的素材。为了将这一层的各组成部分与其他方面区别开来，他将它们称为叙述“要素”。按照结构主义理论的顺序，这些要素以某种方式组织成一个故事。将各种要素排序到一个故事中涉及到几个过程，这些排序原则只有一个假设的状态，它们的目的是使内容材料在故事中呈现的方式成为可能。通过排序原则形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故事的特殊故事。而特定于一个故事的特征即为“形态”^{[5]8-9}。米克·巴尔的这一区分颇类似于西摩·查特曼就“故事”与“话语”在叙事功能上的不同分工。杰拉尔德·普林斯对这一偏重形式的区分有深入的剖析，在最常见的叙事批评类型中，叙事学家很少或根本不关注故事本身，如被叙述与被表征的内容，而是集

中于话语、叙述,以及“什么”被表征的方式^[6]。在丹尼尔·潘代看来,这一形式主义倾向早在美国叙事学奠基者布斯那里就已经确立了基调:布斯将叙事学的重心放在修辞手法的运用而不是对故事元素的关注上。而这一倾向形成的更内在原因在于,叙事学研究者并不知道如何去研究这些要素。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把叙事理解为是作者为达到某种效果和意义而做出的系列选择比较容易,但若要去探究“事件”或“行动”的构造却要困难得多^{[1]3-4}。

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丹尼尔·潘代的身体叙事学建构就具有格外重要的理论意义。值得注意的还有文论家彼得·布鲁克斯,他的《身体活:现代叙事中的欲望对象》一书详尽梳理了18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中的身体叙事史。他认为,身体是意义的来源和场所,如果身体不成为叙述意义的主要载体,故事就不能被讲述^[7]。相较而言,丹尼尔·潘代的论述更具体系建构性,他从女性主义叙事学入手探讨叙述之“如何”(how)与“是什么”(what)的问题。较旧的女性主义批评更多关注叙事文本中描述女性的方式或隐含的社会秩序,比如朱迪斯·费特丽(Judith Fetterley)的《抗拒的读者》就是如此。她研究的重点不是这些叙事文本如何控制视角或声音,而是研究文本中女性自身的表现。这种研究方式与中国当代“身体叙事”话语有近似之处。晚近的兰瑟和沃霍尔等人则更关注叙述技巧方面的问题,他们将重心转移到如何以叙事的方式呈现女性主义问题。在谈到苏珊·苏莱曼1985年编辑的《今日诗学》特刊时,丹尼尔·潘代引用巴尔的论述,强调一种能调和“如何”与“是什么”的身体叙事理论的重要性:“当然,这个文集谈论的很多内容都有关‘叙事’与‘身体’,但两者很少以一种已产生的身体叙事学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讨论”^[16]。显然,丹尼尔·潘代的身体叙事理论是建立在“如何”(how)与“是什么”(what)有机结合的基础之上的。

三 身体叙事学建构的路径与内涵

在上述讨论基础上,丹尼尔·潘代从身体出发重新定义“叙事”,建构起了兼顾“要素”与“形态”的身体叙事学。

丹尼尔·潘代认为,叙事作为一种批判性概

念的出现需要被历史化,它以具体、历史的方式处理人物、事件和情节^{[1]186}。有两条探究路径贯穿身体叙事研究:其一,考察身体是如何被用作故事的组成部分的,并通过使用传统叙事要素如情节、角色和背景来达成这一点。身体叙事学这一路径丰富了传统叙述术语,并提供了对故事进行分类和分析其效果的实用分析工具。借此,可以看到在故事元素中身体如何发挥作用。其二,身体叙事学可以质询身体如何影响我们谈论和分析叙述的方式。身体不仅对讲故事有用,而且对讨论故事的重要性和描述阅读体验也很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叙事学自然地将对叙述术语的分析转向叙述解释学理论——故事如何变得对读者有意义。不同文化和历史对身体的不同想象方式所产生的历史比较,会促使我们思考叙述解释学的历史条件。丹尼尔·潘代围绕这两条路径来展开身体叙事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他提出:首先,要分析身体在人物塑造中的叙事运用。为此,我们可以通过叙述来直接或间接地定义四种基本关系类型:身体必须与文本中的其他物体区分;必须分类;必须与自身外部的世界相关联;必须被赋予一定程度的具身化。这一图解提供了区分不同形式人物刻画的方法。其次,要关注叙事情节与身体的二重性问题。赋予叙述秩序的叙事结构,如诺斯罗普·弗莱的宇宙学模式、女性主义批评家的社会轨迹模式,均与身体有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身体似乎为对叙事事件的思考提供了两种矛盾的东西:一方面,身体代表了所有那些粗笨的物理事件,这些事件与包罗万象的模式背道而驰;另一方面,身体提供了叙事给予事件的顺序。其三,要关注身体与叙事空间、背景理论的关系。背景总是通过参考人物身体可以进入的其他地方来组织——身体上、想象上和感觉上。这种区别提供了一种复杂而又非常灵活的思考叙事背景的方式。利用这种由身体性构成的场景超越自身的想法,可发展出一种“动力学”叙事理论;它既基于空间的不稳定性,也基于时间的持续运动。叙事身体挑战了既有模式,在故事中创造了“扩张”;同样,身体也使背景变得不稳定,迫使其不断运动。因此,我们可以把叙事看作是一个空间运动问题,而不是一个时间变化问题。其四,要关注与身体有关的定位问题。通过定位,

身体叙事学最终变成了文本解释学的问题。早期小说的历史表明，叙事权威性是通过操纵叙述中的具身性而建立起来的。18世纪小说批评家注意到不同人物具象化的运用——创造出中心的、相对非具象的男女主人公以及更具象化的外围人物。对他们来说，外貌是一个重要得多的人物形象塑造要素。据此，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在情感小说和现代主义叙事中如何运用具身化来创造叙事权威，以及如何从一个角度来看待叙事^{[1]12-15}。

丹尼尔·潘代在反思传统叙事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身体叙事理论的总体框架，确立了研究的基本对象。他不仅关注有关身体叙述要素“是什么”（what）的问题，还对这一叙述形态之“如何”（how）展开深入探讨，而与此相关的研究方法尤其值得留意。丹尼尔·潘代特别注意身体叙事的历史性，如他所言，著作中引用的林奇（Lynch）、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加拉格尔（Gallagher）等人的创作或论述都强调叙述的特定历史条件，甚至都是反叙述（anti-narratological）的。这不意味着进入彻底的历史主义状态。丹尼尔·潘代认可一种具有混杂性（hybrid）的结合了叙事普遍原则与历史性的中间状态。他将历史主义的话语分析与普遍的理论诉求有机结合，在语境与文本、历史与理论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意味着将叙事（包括身体叙事）看作是一个适度的历史概念：尽管叙事反映了特定的历史条件，比如它是如何成为研究对象的，在不同的时期又是如何被赋予文化意义的，但它仍然描述了一种超越了从文艺复兴后期到今天的一些特定历史表现的话语类型。这就将叙事学家归因于叙述的特质与特定历史时刻出现的想法和信念关联起来^{[1]185}。有意味的是，布鲁克斯也强调要将身体嵌入叙事历史中，关注身体的叙述和叙述的身体所体现的具身化意义^{[7]xi}。由此可见，有关身体叙事的两个代表性理论家丹尼尔·潘代和布鲁克斯既构造了身体叙事学理论形态，也呈现了更具拓延性与适应性的身体叙事研究方法论。

丹尼尔·潘代等理论家在立足叙事学之聚焦“如何”（how）这一形式层面的同时，又深入历史内里，展现出对叙事学形式倾向的适度节制与超越。借此，他们以历史为视界，以“身体”为话语轴，完成了对叙事学阐释机制的深层转换。也就是说，以历史、身体、叙事为关系项，围绕

“身体”这一语义核心，组构出了一个更具普泛效能的有机阐释体系。布鲁克斯就说，文学中的身体问题之所以特别有趣，是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和张力，一种“自然”和“文化”之间不可消减的张力，两者相互依存的感觉并存。在充满想象力的文学作品中，身体是引人入胜的对象，同时又是另一种物质之外的具有形式区分性的意义投射^[7]。丹尼尔·潘代认为，身体的塑造不仅受到主题或文化的影响，而且还受到作者表达身体的特定叙事术语的影响^{[1]57}。由此可见，这一阐释体系包括叙事形式与文化历史两个基本维度，而有关身体的文化观念就刻写在叙述结构、句子样式、叙述视角等修辞形式中。

如前所述，本土“身体叙事”话语更侧重批评与文化研究维度（从文学蔓延到电影、广告、体育学、短视频、绘画、当代艺术、民俗学等领域），在叙事学层面则着力甚微。而且，本土相关论述较多局限于特定时段（尤其是20世纪90以来的文学创作），无法呈现“身体叙事”的时空广度。最显在的问题在于，这类研究往往将“身体”处理为纯粹的叙述“要素”，未能以已有叙事学理论为认知装置，进而构造起丹尼尔·潘代式的体系性理论话语。也就是说，丹尼尔·潘代等人着力解决的“身体”与“叙事”结合问题在本土相关研究中并未得到应有重视与有效解决。因而，在部分学者那里，传统“身体叙事”是一个难以获得学术合法性的理论命题。在丹尼尔·潘代之前，西方学界也面临与本土近似的研究境况。丹尼尔·潘代正是在批判性反思传统叙事学的基础上完成身体叙事学之重构的，其理论兼顾“身体”“叙事”两个维面，是叙述之“是什么”（what）与“如何”（how）的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其理论内涵与外延已经溢出传统意义上的身体“叙事学”（聚焦“如何”（how），局限于结构形式层面）之边界。他曾反复言及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自然符号”（Natural Symbols）概念。这一概念暗示了身体变得有意义的方式中的一个悖论：自然必须用符号来表达，自然是通过符号来认识的，这些符号本身是经验的构建，是思维的产物，是技巧或惯例的产物，因而是自然的反面。身体能够提供一个自然的符号系统，因为身体为思考（下转第122页）